

中国古代秘史

· 理想藏书系列 ·

吴登美 主编

叁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秘史

吴登美 主编

第三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三卷 目录

宋元秘史下

元代朝野秘闻

元代“诈马宴”	(1)
耶律楚材出任中书令	(2)
耶律楚材为百姓而泣	(3)
忽哥赤中毒身亡 赛典赤临危受命	(4)
姚枢佐大政	(5)
许衡三辞隐	(7)
卢世荣善理财	(8)
阿合马总揽财权	(9)
阿合马任人唯亲	(9)
皇太后旧情未了	(10)
借刀杀人	(11)
铁木迭儿乘机复仇	(12)
铁失弑君杀相	(13)
停科举之争	(15)
伯颜震主	(16)
逐太后用贤相	(17)
开河变钞	(18)
元代利用权臣除权臣	(19)
刘伯温报国无门	(19)
仗势欺人的衙内	(20)

明代秘史

大明朝野秘录

朱元璋好儒	(21)
明代文字狱种种	(22)



北方举子 江南考官	(23)
马皇后尊师重法	(24)
天子戒风流	(25)
不可使我法不行	(26)
驸马恶人先告状 高僧借医献良方	(27)
钦差投石 御史忘形	(30)
小官吏实封奏书	(34)
刘基运筹帷幄	(38)
太祖悲咽女子受难	(40)
胡惟庸寸磔市曹	(40)
李善长整饬三军	(42)
郑和下西洋	(42)
僧人佐政	(44)
马铎奇遇两妇人	(45)
设西厂施淫威	(47)
明宦官专权	(48)
众官讨好阿丑演戏	(49)
百姓救于谦	(51)
状元多数有德行	(52)
以貌定魁	(53)
弘治帝治世兴邦	(54)
况钟的刀笔功夫	(57)
况钟不遗余力治贪顽	(58)
王阳明巧计脱身	(60)
刘瑾迎合武宗	(61)
世宗仁孝	(63)
为长寿世宗尚道	(64)
张居正功高震主	(65)
昆腔曲圣魏良辅	(68)
魏氏其人	(68)
昆山之谜	(69)
十年之光	(70)
南词引正	(71)
梁郎雪艳词	(72)
巨奸笔下的雅作	(74)
抗倭名将戚继光	(76)
尚美人更衣侍寝	(78)
崔御史甘做义子	(80)
贵族的流氓性	(81)
明熹宗的匠才	(83)

明宫宠幸阉臣	(84)
施恩威破山中贼	(86)
遇狡寇君臣无措 开马市众说纷纭	(87)

清代秘史上

皇清秘史

述前朝关东钟王气 谈天女塞外记红妆	(90)
骆驼峰上虎拽娇娃 布鲁湖边鸟衔朱果	(92)
小英雄顺流登彼岸 奇女子乘势献良谋	(94)
西略东征祖基开拓 新欢旧恨情致缠绵	(96)
古埒城章京携美眷 佟家堡红粉识奇才	(98)
传警报李成梁起兵 中奸谋觉昌安丧命	(100)
捧遗甲矢志报前仇 结强邻登堂联姻缘	(103)
布防诱敌大破联军 弃约背盟遽翻婚约	(105)
八旗创制开国称尊 七恨告天兴兵寻衅	(108)
俏佳人委身媚降将 奇女子报国卫京师	(109)
四路大军东拼西凑 连番恶耗兵败将亡	(112)
念故交冈上寻遗体 怀深恨刀下誓狂言	(114)
马上蛾眉英雄气短 城中蚩触疆吏何心	(115)
覬觐大宝贝勒逼宫 邂逅围场玉儿款客	(117)
母仪天下册立娘娘 闲步园中爱怜叔叔	(119)
下朝鲜辱王蒙巨创 入龙井降将出奇兵	(121)
袁崇焕蒙冤下囹圄 洪承畴受命援锦州	(123)
克敌功高松山奏绩 爱才心切客馆娱宾	(125)
膺宠命洪学士趋朝 遂性怀睿亲王监国	(127)
逆迹昭彰难逃法网 英姿爽飒妙选佳宾	(128)
变起深宫惊传晏驾 涎垂美色强抢图奸	(130)
崇祯帝捐躯殉社稷 多尔袞奉命略中原	(133)
皇言如纶太后下嫁 属邦有美睿王求婚	(134)
马背翻身睿亲王丧命 蛾眉锁恨董小宛入宫	(135)
入宫见妒遽唱离鸾 弃国如遗徒歌长恨	(137)
康熙乱伦私通姑母 胤禔练艺谋夺皇储	(139)
康熙帝巡幸五台山 皇四子结交天下士	(140)
三次南巡太湖遇刺 一场大狱名士沉冤	(142)
废东宫诸子争太子 进王府哥儿变姐儿	(144)
圣祖殡天变更遗诏 雍王即位残害同胞	(146)
建新宫塑装欢喜佛 平青海犒劳大将军	(148)



拥佳人提督吹号角	训骄子教读建高墙	(150)
鸟尽弓藏功臣骈戮	狐悲兔死宰相乞休	(152)
天子多情占奸侄妇	秀才造反牵累无辜	(154)
钗光剑气公子情多	鬓影衣香美人睡足	(157)
宝亲王园中奸舅嫂	雍正帝灯下失头颅	(158)
女侠复仇道遥远颺	鱼娘舞剑倾慕求婚	(161)
平回部万里建殊勋	进香妃千秋传佳话	(163)
金殿献俘逆回授首	深宫蹙额弱质存贞	(165)
荒冢题词徒留幽恨	回妃承宠特荷殊恩	(167)
念阁老乾隆下江南	办皇差盐商争面子	(169)
点缀湖山缙流接驾	削平叛乱猛将立功	(172)
福康安荡舟惊丽质	马佳氏再世证前盟	(174)
逛私娼皇后持正	接圣驾天子留情	(177)
守贞节烈女惨死	傲荒淫皇后苦谏	(179)
富察后受辱为尼	小霸王行凶抢妓	(181)
乾隆帝侠义除凶	老和尚为友鸣冤	(184)
戍伊犁皇孙屈死	买卖街天子宣淫	(187)
假天子花赛英受骗	真朋友余大海报仇	(189)
报父仇美妾杀夫	呈小说孝女瞞亲	(193)
代帝捉刀死兴文字狱	有情眷属生做水鸳鸯	(195)
疑心行刺姊妹含冤	游目骋怀花木争妍	(197)
珠光宝气点缀名园	雾鬟云发巡幸别馆	(200)



宋元秘史下

元代朝野秘闻

元代“诈马宴”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件大事，也就是用兵打仗、围猎和宴饮。大规模的战争正在江南进行，围猎则需要合适的季节，现在朝廷中的头等大事就是朝会后例行的宴饮了。

出席宴会的人，都要身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衣服，称为“质孙服”（又译为“只孙服”），由皇帝颁赐给蒙古宗王、后妃、驸马、朝廷大臣和近侍卫士等人。没有质孙服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大宴。宫廷大宴，一般要进行三日，每日换一种颜色的衣服。这种大宴，被称为“质孙宴”；波斯语把“质孙”叫做“诈马”，所以又称为“诈马宴”。

大宴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蒙古大臣高声诵读“大札撒”。“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颁布的法令，其中既有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有成吉思汗的训言。每个蒙古宗王都收藏一部大札撒，并且要熟悉它的内容，念念不忘“祖训”。

在蒙古宫廷中，能够参加诈马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谁也不愿意因为不会喝酒而失去这大好的机会，所以在宴会前宣读祖训，只是警告人们不要由于酒醉而失态，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祖上创业的艰辛和对后代的期望。这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

在大宴上饮用的，有葡萄酒、蜜酒、米酒、阿剌吉酒、黑马乳、舍儿别等。阿剌吉酒用葡萄酒、枣酒等好酒蒸馏而成，制作方法刚从西域传来不久，乃是中国烧酒的鼻祖。黑马乳就是马奶酒，用马奶发酵后搅拌而成，色清味美，是蒙古人极喜好的饮料。朝廷中专门有负责制作黑马乳的人，称为“哈喇赤”。蒙古人称黑为“哈喇”，故有此名。“舍儿别”是用水果或药物、香料配成的清凉饮料，可以解酒，制作方法也是从西域传入的。宫廷中掌制“舍儿别”的人，就叫做“舍儿别赤”。宴会上备有各种食品，而羊肉是必不可少的。每逢大宴，宰杀的羊要以千、万头计。

宴饮时，皇帝和臣僚各有座次，不可越座乱动。旁边有乐工奏曲助兴，还有各种艺人献技，热闹非凡。

大宴上用的各种器具，非常考究，最引人注意的是贮酒的大瓮，时人称为“酒海”。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制成的湊山大玉海，由整块黑玉雕成，高70公分，直径1.35公尺，重约3500公斤，放在万寿山上（现在依然陈列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的玉瓮亭内）。



在大明殿上，还摆放着一架七宝灯漏。这架灯漏是顺德邢台人郭守敬设计制造的，高一丈七尺，以金为架，共分四层。灯漏上既有调节机内水流缓急的戏珠龙，又有代表日月星辰的四神和按时跳跃的龙虎乌龟。更为奇妙的是漏中装有十二个小偶人，各执子、丑、寅、卯等时辰牌子，每个时辰的初刻，木偶人执牌开门而出，面对御榻报时。灯漏下层四角，又各立一人，分掌钟、鼓、钲、铙，一刻鸣钟，二刻敲鼓，三刻响钲，四刻鸣铙。当然，在饮酒正酣的时候，人们都不太留意时间，因为大宴总是要到日暮点灯时才散。

耶律楚材出任中书令

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为了征服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扩大，他需要各种人才。这时，他打听到在他统治下的燕京城中，有个博学多艺的耶律楚材，便派专使前来礼聘，耶律楚材陷在燕京城中已经三年了，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除了礼佛参禅而外，无事可干，这时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不应轻易放过，便立即应召。

从蒙古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年），成吉思汗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是对中亚的花剌子模用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耶律楚材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这一时期，耶律楚材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担任成吉思汗的必闾赤，掌管文书；二是在塔刺思城屯田。三是在司天台担任春官，用他的律历星卜等方技之术，为成吉思汗服务。

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可以全都委托他。”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已经用自己的知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拖雷监国已经两年，决定召集宗亲推举大汗。当时，成吉思汗诸子皆从各自的驻地来到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拖雷宣布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承继大位。窝阔台则认为拖雷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所受训教较他人多，大位应由拖雷继承。推来推去，会议开了四十天，也未作出决定。

耶律楚材觉得会议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便对拖雷说：“推举大汗，是宗社的大事，应该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早作决定，以免发生争端。”拖雷说：“意见尚未统一，能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说：“过了明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还非常迷信，听了这话便决定在第四十一日举行登基大典。

大典由耶律楚材拟订仪式。耶律楚材为了使会议开得威严肃重，让所有宗亲都能恭敬顺从，便事先对亲王察合台说：“你虽是大汗的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然是臣，臣下对君按照礼节应当跪拜。只要你带头拜，其他的人就莫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他说得有理，在正式的即位大典上，便率领皇族及臣僚帐下跪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后，察合台对耶律楚材说：“你真是社稷的功臣呵！”

窝阔台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准备对那些没有按时前来朝拜的王公大臣处以死刑。耶律楚材知道后便对他说：“陛下新即位，应当力求安定，对犯错误的人，应当宽宥，否则矛盾放大，政局反而不稳。”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从前不拥护他的人，后来都拥护他了，政权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耶律楚材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应兴应革的事太多了，耶律楚材选择了一些急需办理的，写了《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危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窝阔台汗看了疏以后认为所奏各事，皆可听从，唯有送礼一事难于禁绝，便对耶律楚材说：“如果是自愿馈赠的，可以不追究吧！”耶律楚材说：“这是蛀政害民的开头啊！哪能听任不管呢？”窝阔台汗说：“凡你所奏，我都依从了，你就不能依从我这一件吗？”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召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根据耶律楚材建议设置的十路课税使，送来了许多粮食布帛和金银，陈列在宫廷中，数量很多。窝阔台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啊！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做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耶律楚材为百姓而泣

耶律楚材作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促使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法”，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要求，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也不是全都言听计从。有时耶律楚材发现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窝阔台汗不仅不体谅耶律楚材的好意，反而说什么：“你想要打架吗？你就知道为百姓哭鼻子！”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

但耶律楚材对于蒙古立国中原，是很有贡献的，因而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万事草创，各种制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极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原来的某些制度和做法，很难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需要，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窝阔台汗是比较开明的，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窝阔台汗言听计从，制订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

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习惯法，免难民、降俘之死，蒙古统治者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残暴的杀掠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加了抵抗者持续反抗的决心。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军将征河南，耶律楚材便请求不要残杀当地居民，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所需。窝阔台汗说：



卿言是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次年春，大军南征，陕洛秦虢等州的人民纷纷逃往山林洞穴躲避。窝阔台汗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有些蒙古贵族反对这个诏令，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请求制旗数百面，发给逃民，让他们回到蒙古军控制的州郡去种田。据说，因此而活下来的逃民不可胜数。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大将速不台攻打金国的南京开封府，即将攻下时，派人向窝阔台汗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听说后忙向窝阔台汗说：“我军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所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如果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汗听了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制造弓矢甲仗、金玉器皿的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之家，都聚在这个城中，如果全都杀了，我们将一无所得，那这个仗就白打了。”窝阔台汗点头称是，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罪大不赦外，其余皆免罪不问。”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城中的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因此而免遭屠杀。从此以后蒙古对南宋用兵，攻取淮汉诸城，也都为此作为“定例”，不再“屠城”，只诛“首恶”。

忽哥赤中毒身亡 赛典赤临危受命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四年之后，都元帅宝合丁企图专横一方，竟与王府人员串通一气，在酒中下毒，要毒死忽哥赤。劝农官张立道闻讯后闯入王府，忽哥赤已经中毒，不能讲话，只是抓住张立道的手伸入自己口中，让张立道触摸自己满嘴的烂肉，说明自己是被害的。忽哥赤死后，张立道密结十三人，准备起而讨贼，并派人赴京城告变，不想事情败露，张立道等全被宝合丁逮捕入狱。

张立道族兄张忠领义士劫获成功，救出立道北逃，至吐蕃境，遇见朝廷派来调查忽哥赤落难事件的御史大夫博罗欢，报告了前后详情，并与博罗欢一同南下。宝合丁听说朝廷来人，准备了重金礼品送来，希望来者敷衍了事，不要穷究案情。博罗欢因宝合丁握兵在外，拒收礼物可能激起兵变，暂时收下了礼品，麻痹宝合丁等，随即迅速赶到大理，将宝合丁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返回大都后，博罗欢将宝合丁所送礼品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中书省。

忽必烈对博罗欢的机智果断十分赞赏，同时为物色合适人选前往云南重建统治秩序而犯难，最终他选定了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又名乌马儿，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赛典赤”是阿拉伯语 Saiyid、Ajall 二词的联读，Sai yid 指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穆罕默德之婿）后人，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裔；Ajall 的意思是“最至尊的”，这个称号大致相当于汉语的“贵族”。成吉思汗征中亚，赛典赤率千余人迎降，随从成吉思汗东来，成为“怯薛”成员。成吉思汗只称呼他为“赛典赤”，以示宠信。窝阔台至蒙哥汗时，赛典赤历任丰、净、云内三州都龙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燕京路总管等职，逐渐熟习中原文化，积累了适应于统治中原地区的丰富经验。

忽必烈即位后，赛典赤仍然得到重用，历任燕京宣抚使、吏户礼三部尚书、大司农卿、中书省平章政事、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等职，无论在中央机构任职还是担任地方官职，都有突出政绩。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忽必烈命赛典赤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衔行省云南，总管云南政务。忽必烈对他说道：“云南是我亲自率军攻占的，由于用人失误，引起

混乱，民心浮动，现在我想选择老成持重的大臣前去安抚人心，整顿吏治，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赛典赤没有辜负忽必烈的厚望。他很快前往云南，建省治于善阐（今云南昆明），并做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事。

继忽哥赤之后，宗王脱忽鲁坐镇云南。赛典赤南来，有人挑拨离间，声称此举一定是来夺脱忽鲁之权，脱忽鲁乃调集军队，准备兵戎相见。赛典赤闻讯后，派其子纳速刺丁去见脱忽鲁，转达他的来意：“皇帝因为云南守臣不称职，导致诸部叛乱，特派我来安抚，并且告诫我入云南境后即要设法安定民心，我不敢专断此事，希望大王派遣一人来共同商议良策。”脱忽鲁派遣亲信二人至赛典赤处，探看虚实。纳速刺丁与他们混熟，以兄弟相称，这二人乃用儿子见父亲的礼节向赛典赤跪拜，并献上名马。赛典赤设宴款待二人，宴后又将忽必烈赐给他的金宝、饮器等赠给他们，二人大喜过望。赛典赤认为他们虽是王府亲信，但没有正式官爵，不便处理政务，请求脱忽鲁同意授与他们行省断事官之职，脱忽鲁疑云全消。行省与王府的关系协调一致了，当地政令基本上可由赛典赤掌握。

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赛典赤请求改变云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隶属关系，以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由行省节度，改变各地原来按蒙古制度划分的万户、千户为路、府、州、县，选贤能者为令长。忽必烈同意赛典赤的改革措施。当年正月二十一日（2月7日），赛典赤把改定的各路名号报给朝廷，得到了批准。

通过赛典赤等人的努力，加强了元廷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使云南的地方行政机构达到了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水平，结束了云南长期自立一方的历史。

赛典赤治理云南，一方面提倡文治，不滥用武力压服当地各民族的首领人物，一方面尽量照顾到当地民俗，不强迫当地人移风易俗。他的作为，毕竟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朝廷命官不断前来，当地土吏认为升迁困难，颇有怨言。一些土吏跑到京城，向忽必烈奏报赛典赤有专横行为。忽必烈用人不疑，认定赛典赤忧国爱民，一片公心，这帮人纯系捏造事实，诬陷良臣，乃命人将他们押回云南，交给赛典赤治罪。赛典赤为安定人心，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委以官职。这些人当然感恩戴德，从此竭力为他奔走效命。

姚枢佐大政

公元1259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他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开始重用姚枢、刘秉忠、许衡等一批汉臣，在全国大力推行汉法，并接受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按照汉法确立国家机构，制定官职制度。这年，忽必烈下令在全国设立十道宣抚使，一方面监督各诸侯，另一方面推行劝农政策。在各诸侯中，以严忠济最为强横难制，因此忽必烈特派姚枢为东平（今属山东）宣抚使。姚枢到达之后，先置劝农、检察二官吏，负责办理新政务和监督严忠济的军政机务。姚枢按照民户的财力人力，合理均摊赋税差役，罢除铁官职位，招抚农民安居务农，工商勤于经营，很快就使东平地方的行政得到整顿，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统二年（1260年），姚枢被任命为大司农。身为廷臣，他看到元朝朝廷上下的朝仪礼制十分混乱和落后，就向忽必烈进言整顿朝仪礼制。忽必烈有心仿效历代王朝君临天下的气派，建立统治秩序，便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诏姚枢“赴中书议事，谋定朝格”，并且命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到中书省从事制定朝仪礼制的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很快完成了制



定工作。姚枢与中书丞相史天泽制定好的条文上奏忽必烈审阅，忽必烈大为满意。

中统二年，李黼在山东密谋发动叛乱。他秘密将其作为质子留住京城儿子李彦简召回。忽必烈得到情报后，料定李黼想谋叛，于是召问姚枢：“卿预料李黼将采取什么行动？”

姚枢答道：“按我看，李黼面前有三条路，首先，他可能乘我大军北伐，后方兵力不多之机，出兵占据山东，进攻河北，据守居庸关，动摇汉地民心，这是上策；其次，他可能与宋联盟，固守自己的地盘，并多路出兵骚扰我边地，使我忙于奔救，此乃中策；最后，如果他出兵济南，等待各地诸侯应援，此为下策，必然成为瓮中之鳖。”

忽必烈又问：“那么依你看李贼将出何策呢？”姚枢自信地答道：“必取下策”。这下忽必烈心里有了底，便从容地静待事态的发展。次年，李黼果然兵进济南发动叛乱，号召各路诸侯应援，结果很快便被元朝大军剿灭。

中统四年，姚枢被晋升为中书省左丞相。这时，他看出经过李黼之乱以后，忽必烈对汉族地方军阀十分不信任。为了防止汉族地方军阀再次发生叛乱，也为了缓和元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使忽必烈不至于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其他汉族军阀，姚枢及时奏请忽必烈“罢世候”（即罢除诸侯世袭）。这个计策正中忽必烈的下怀。就忽必烈的本心来说，他是很想这样做，关键问题是如何做更为妥当。恰在这时，以史天泽为首的一批地方军阀，以主动请求“释兵权”的方式向忽必烈表示谢罪和孝忠。忽必烈顺水推舟，剥夺了他们的实权，消除了分裂和叛乱的隐患，同时也使汉族地方军阀免遭覆灭，从而避免了内耗可能给元朝政治力量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元朝以蒙古人为首的政治联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至元十年（1273年），姚枢官拜昭文馆大学士，受命详定朝廷礼仪制度。同年，元军攻克襄阳，取得了征宋战争的一个战略性胜利。于是，忽必烈召文武大臣商议对南宋进行最后的征讨。

姚枢上奏道：“如果任命征宋军统兵大将，非右丞相安童和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忽必烈也十分了解伯颜的才能，就任命他为征宋军统帅。至元十一年七月，领命南征的伯颜行前来向忽必烈辞行，忽必烈交给他一份敕书，命令他只诛杀抵抗者，余者一概禁止杀掠。并对伯颜说：“古往今来，善取江南者，仅曹彬一人。你如能不妄杀，便是又一个曹彬。”伯颜领旨出征，将皇帝的敕令传至全军。

战争开始后，元军恩威并施，势如破竹，很快就渡过了长江。

次年，征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南宋军民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元军对许多城市进攻都是经过血战才克服，因而元军的损失很重，再加上天气酷热，元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驻夏休整。

姚枢了解到前方的战况后，就向忽必烈进言道：“去年伯颜出征，由于陛下下了‘不杀降’之诏，使伯颜渡江进展顺利，我军没多久，西起川蜀，东至海边，降城三十，得百姓三十万户。自古平定南方，没有如此神速。然而，自今年夏季至秋季，我军竟一城未降。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军官不顾国家大计，不体量陛下的仁厚之心，不执行陛下的怀柔政策，唯利是图，滥杀无辜所致。这样下去，所降城除四壁之外，一片废墟，土地虽广，没有百姓，国还有何用？我所说，在扬州、焦山、淮安等地战事中，宋人皆殊死斗争，我军虽获胜，却伤亡惨重。南宋既然不能作为蕃国而存生，那么临安未必肯轻易投降。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宋人并不是不怕死，而是由于担心我们宣诏的不杀降之令信用不坚，骗其投降后又遭杀掠”。

忽必烈觉得姚枢分析得很对，就问：“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做呢？”

姚枢回答说：“我认为，应立即派遣一名特使，专门辅佐伯颜宣布止杀令，有敢违者犯

者必杀不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赏罚分明，恩信必行，圣上无须焦虑，军力不再浪费。”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重新下了杀降之诏，督促前方将帅严格按诏行事。元军统将伯颜、董文炳等都能很好地执行此令，使南宋临安顺利降附，千百万宋民幸免于难。

许衡三辞隐

中统元年（1260年），许衡北上任国子监祭酒。因与王文统意见不合，不久谢病辞职还乡，教授生徒。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召其至上都咨问政事，他上疏《时务五策》，强调北方游牧民族入中原汉地，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统治。至元六年（1269年）受诏与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和官制，使国家体制大体齐备。至元七年（1270年）受中书右丞。这时忽必烈急于财用，宠信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弹劾阿合马专政罔上，蠹国害民。忽必烈未听，许衡见势不利，称病辞职。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命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使主持教育。但由于权臣阿合马等掣肘，难有所作为，至元十年（1273年），又辞归乡里。

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给忽必烈的上疏中指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他列举历史上北魏、辽、金进入中原后，改行汉法，“历年最多”。而其他不推行汉法的“皆乱亡相继”的先例，认定蒙古要统治全国，“非用汉法不可”，这好比“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然而蒙古权臣勋旧不愿变更旧制。他劝谏忽必烈不为流言所动，坚决革新政治，推行汉法。在许衡等儒臣劝说下，忽必烈提出“祖述变通”的统治纲领，在保留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实行汉法。

许衡在上疏中说，上古之圣君尧舜，得贤相稷、契辅赞，“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王教以善民心。”由于重农重教，使道行、民富、兵强、人才盛、国势强。“而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殷游惰之人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愚瞠而督行之，十年以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在许衡等劝告下，忽必烈在做藩王时就认识到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继汗位建元后即下诏禁止占用农田为牧场和践踏农田，设劝农司，颁行《农桑辑要》，督促、指导农业生产。还召集逃亡者，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减免租赋，设置粮仓，赈济灾民，使元初农业得到恢复发展。

许衡把重教与优农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他说此二者之行，则“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他在上疏中指出“自都邑而到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室以下到庶民之子弟，皆人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在许衡奉劝下，世祖下诏要求各地广立学校，培养人才，以备选用。

许衡以《小学》、《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用“圣人之道”，程朱理学教育生徒，以“存天理，去人欲”，培养“贵为公相”或“甘为贫贱”的“志士仁人”。由于他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更易为人接受，从而有利于程朱理学的普及，对元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许衡是元代著名理学家，是唯一身居相位的“道学君子”。他辅佐元世祖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他对理学作了宽泛的阐释，普及推广了理学，使理学成为元朝的“官学”。他的治国思想和实践对蒙元适应历史发展趋势，加速封建化和巩固元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因其为官惠能清正，为教诲人不倦，故其去世后，家乡“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外，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卢世荣善理财

卢世荣生活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畏兀儿人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元世祖召见，奏对称旨。又召中书省官员与卢世荣廷辩，不能胜卢世荣。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被罢，起用安童为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左丞。安童、卢世荣既居中书，为更好理财治国，又劝告元世祖对那些虽与阿合马有牵连，但善于规划钱谷，通才可用者，不应当做罪人而应给予擢用，使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撒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

卢世荣执掌财政，当即奉旨整治钞法，提出并实施理财措施。

整理钞法是卢世荣经国治世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主张一种钱、钞并行，反对专以纸币为流通工具的制度。他建议废除人民不得私自买卖金银的禁令，允许金银自由买卖，并发行铜币，减少社会对纸币需求的压力，从货币制度本身去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削弱通货膨胀的趋势。卢世荣不仅强调控制发钞，还努力采取各种财经措施，多方面地扩大财政收入，这也是对付通货膨胀的重要对策。他还主张发挥平准库和常平仓制度的作用，以稳定物价，这对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有帮助的。卢世荣能提出一套货币、财政和物价相互配合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卢世荣主张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平准库的作用原为通过现金和钞币的兑换以稳定宝钞的购买力。将平准库扩大为平准周急库，使库存的金银除作为稳定宝钞购买力之用外，还可作为向贫民提供低利息放贷的资本。

卢世荣为反对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还注意价格的稳定和降低。他改革货币制度，设平准周急库，就是为稳定钞币的购买力，使物价不致继续上涨。他主张实行酒专卖，既增加国家酒课收入，也抑制商人抬高酒价。创立常平盐法，由国家各路控制三分之一的盐，平价出售。这也是为平抑盐价，增加财政收入，保护社会需求。设常平仓，以国家专营冶铁所得利润加上平盐局所得盐课收购粮粟充实常平仓，在粮价上涨时，使之有力量开仓平价出售，控制粮价上涨。通过这些措施稳定价格，抑制通货膨胀，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国内商贸方面，卢世荣放松了一些控制，如竹货业、渔业。他使“怀孟竹货，人民买卖收税”，“江湖听民捕鱼，只纳鱼课”。这对促进农副业和渔业的发展，农副产品的流通，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增加封建国家税收，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对外贸易上，卢世荣的政策是维持西北陆路贸易的自由往来，垄断海外贸易。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卢世荣提出国家垄断海外贸易的具体政策，建议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国家造船给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利润官七商三分配，严禁私人泛海进行外贸。“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藉其家产之半。”他提出这种垄断海外贸易的“官本船法”，目的是抑制权贵富豪，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卢世荣秉政百余天，在减免赋税、私租、劳役负担，改善人民处境方面多次提出建议。他的这些建议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元朝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阿合马总揽财权

阿合马，出生在花刺子模细浑海（今苏联锡尔河）畔的费纳克忒城，回回人。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他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门掌管财赋大权。这一年，阿合马从一个不出名的小官被提拔而总揽国家财税大权，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阿合马被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独揽了财赋大权后，心花怒放，乐不能寐。可是，他面临的难题也很多：各地上缴赋税差额很大，不能如数上供；蒙古贵族的奢侈生活，耗费惊人；忽必烈每年照例要对文臣武将大肆赏赐，需财不少；庞大的军费开支，更是个无底洞。由于这一切，摆在阿合马面前的困难成堆。怎样才能尽快解决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取得忽必烈的青睐，保证自己官运亨通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知道忽必烈喜谈财利之事，嗜财贪利，重于一切。于是，他决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迅速增加经济收入，以取悦于忽必烈。为此，他先后采用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追征和擅增赋税：凡过去因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减免或未交的赋税均极力追征。

其次是官办矿冶。当时矿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它除了一小部分为官办外，多数是私人冶铁。阿合马认为将私冶统统改为官冶，由官府控制，高价出售，可以赚到大量钱财。他的主张得到忽必烈允许，于是将铁冶改为官办，由官方制造农具向农民出售，禁止私造农具。接着，他又扩大官冶规模，大兴铁冶。

再次是实行钞法和盐法：阿合马上任后不久，就禁止私盐，并在产盐地区专门设置了巡禁私盐军，以缉查私盐。

阿合马的这一系列理财措施，迎合了忽必烈的嗜财心理。人民的脂膏源源不断地流进元朝国库，阿合马的官职也就不断上升。至元元年，罢领中书左右部，超升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元朝中书省掌有实权，“天下庶务，统于中书”，而平章政事又是中书省长官之一，可见对阿合马的宠信。至元三年（1266年），设立制国用使司，又以阿合马兼领使职。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忽必烈“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加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因此，忽必烈“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他对阿合马相当信任，以至连钱粮之事也不再过问，放手任由阿合马一人操办。

阿合马任人唯亲

经过一个时期官场风云变幻的阿合马，越来越奸诈、圆滑，对权力的贪嗜也越来越强。至元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为平章中书省事。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阿合马以尚书省的班底控制了中书省，至元十年，阿合马任用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忽辛是个不学无术、毫无才干的蠢货，上任后无所作为，沉缅酒色，极



不称职，故右丞相安童奏请另选他人代之。时隔不久，枢密院的阿合马同党为报答“知遇”之恩，又奏请忽辛为同金枢密院事，这次，连忽必烈都说：“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却而不用。

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看到阿合马把自己的家人亲戚全都安排成要官，便对忽必烈说：“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忽必烈也感到阿合马太过分了，便接受了崔斌的建议，罢免了他们的官职。可是，不久，在阿合马许多同党的请求下，忽辛等人又官复原职。接着，又有人请求恢复阿合马的另一个儿子麻速忽和侄子别都鲁丁、苦思了等人的旧职，忽必烈虽然没有同意，但到至元十六年，阿合马通过多方活动，还是如愿以偿了。别都鲁丁甚至被提升为参知政事、行中省事、河南等路宣慰使，真是“一门悉处要津”。

阿合马不但千方百计地为四个儿子和两个侄子安排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还让自己的家奴忽都答儿等人掌管兵权。至元十七年秋天，又把同党郝祯、耿仁升为中书左丞，狼狈为奸，“阴谋交通，专事蒙蔽”。到此，阿合马权高势重，以至不少大臣畏惧其权势而阿附于他，一些文人也纷纷为阿合马歌功颂德，更有许多商贾为了得到官职而向他大量行贿。他还广占美女，有些人为了当官竟把妻子或姐妹献给他。这些投靠他、贿赂他的人，或大或小都可以得到官职。至元十九年，他在朝廷上下的同党竟多达七百一十多人，可说是势倾朝廷，炙手可热了。他的同党往往依仗着阿合马在朝中的权势，相互勾结，肆意侵吞国家财物。阿合马还强占大批良田，将农民的“附郭美田”“据为己有”。他的私田多达数千顷，牛马牲畜数千头，百姓恨之入骨，“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

皇太后旧情未了

元顺宗皇后弘吉剌氏年轻守寡，但当时环境恶劣，既要抚育两个心爱的儿子，又要防范来自小叔子元成宗及各个方面的种种压力，同时还要为两个儿子的前途谋划，也真够难为她的了。查《元史·武宗本纪》可知海山生于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公元1281年8月4日），海山当皇帝时已经二十七岁，弘吉剌氏也就在四十五岁左右。这时她贵为皇太后，生活条件特别优越。两个儿子久经磨难，对母亲格外孝顺，又为其修造豪华的兴圣宫，使其得以养尊处优，清静无事。不料正因如此，才使她难耐寂寞，倒思念起一个人来，此人便是铁木迭儿。

铁木迭儿为人相貌好又善于逢迎，与弘吉剌氏为同族。顺宗死后，铁木迭儿与弘吉剌氏便常相往来，并给予许多帮助。二人感情暧昧，后来弘吉剌氏被排挤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县），遂与铁木迭儿分离。不久铁木迭儿也被出放到云南省任左丞相。二人相隔万里，更是无可奈何了。再加上弘吉剌氏又忙于为儿子谋得帝位，也顾不上其他。此时长子为帝，次子为太子，身为太后，高高在上，一呼百诺，无人敢管，又耐不住寂寞，便想召回故人，就下一密诏，征铁木迭儿回京。铁木迭儿见此密诏，格外高兴，立即登程，铁木迭儿本来就非常乖巧，善于献媚，此次弘吉剌氏已当上太后，势大位尊，二人可以无所顾忌了。他直接来到兴圣宫，在其中盘桓几天，杜门不出，外人谁也不知道。云南行省多日不见他上班，便报告尚书省，说他擅离职守。尚书省不知内情，据实奏报，武宗当即批发，令尚书



省先查询下落，再据情定罪。一位堂堂的行省左丞相居然丢了好多天，而且还丢在了皇太后的兴圣宫中，也可谓当时的一大新闻。几日后，尚书省又接到诏刺，说奉皇太后旨意，援议亲故例，赦免铁木迭儿的罪名。从此，铁木迭儿经常出入宫闱，紧紧抱住皇太后这棵大树，遂生要揽权之念。

借刀杀人

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和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同为元顺宗和兴圣皇后弘吉剌氏之子。

海山哥俩的父亲顺宗其实没有当过皇帝，他的庙号是海山即位后尊封的。此前的天子是海山哥俩的三叔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十一年（1037年）中历正月，成宗驾崩。

大德十一年中历五月甲申（1307年6月21日），海山入京登极，是为武宗。中历六月癸巳（6月30日），武宗依制册立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让他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

武宗朝原来的庶政大权一归中书省，在皇太子统摄下，由左、右丞相，诸平章政事（权同丞相）分工负责。这本无什么大毛病。但因为当时中书省的高级长官大多是武宗和太子从前的元老重臣，这就阻挡了一些新进官吏的晋升之路。他们恨中书省专权，当然也恨太子。

对此尤为不满的是三宝奴其人。

三宝奴从前曾因罪谪贬武昌。武宗立国时，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翰林承旨学士（皇帝秘书之一）。为了尽快向上爬，他勾结平章政事脱脱虎等人，于至大二年（1309年）提出分设尚书省代中书省理财的动议。大臣们对此并不陌生，因为前朝奸臣阿合马、桑哥就曾用此法争权夺利，所以动议最初根本通不过。后来，武宗大约考虑到中书省政务太繁，就同意重设尚书省。三宝奴也因此平步青云，升为尚书省平章政事了。

有了尚书省这块地盘，三宝奴等人就不断侵夺以太子为首的中书省大权。他们先提出尚书省用人，中书省宣政（发布命令），无形中架空了中书省。既而干脆提出：“中书之务，乞以尽归臣等。（《元史·武宗本纪》）”同时利用尚书大权结党营私，为非作歹。太子和中书旧臣当然对此不满，有的人干脆有参加尚书省“集议”，也不服从尚书省的调遣。三宝奴认为这事的根子全在太子。要彻底控制庶政大权，就必须设法废去太子。

但三宝奴等人深知武宗很信赖弟弟，所以要正面废太子是不可能的。他们便暗中唆使一些太子属官，让他们出面怂恿东宫扩大建置，先尽量造成“僭越”行为，再以此离间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借东宫之手自杀太子。

于是就有东宫官员提出为太子建立右卫率府，编制在万人以上，并准备由太子下令从安西（今甘肃定西县）取兵器来武装这些卫士。太子詹事丞（东宫主管官）王约识破了这个阴谋。他立即对东宫僚属们说：按制度东宫已经建立了左卫率府，现在为何要违制扩建右府？诸公要好好想想，不要因此害了太子！且由东宫移用千里之外去取兵器，人必惊疑。皇上知道后又将作何想法呢？”王约还要大家本着“皇太子事不敢不为，天子事不敢为”（《元史·王约传》）的宗旨行事。太子自己也很听王约的话，处处小心谨慎，“潜龙”不做“飞龙”之事。终于使三宝奴等人挑不出太子和东宫的任何毛病！

